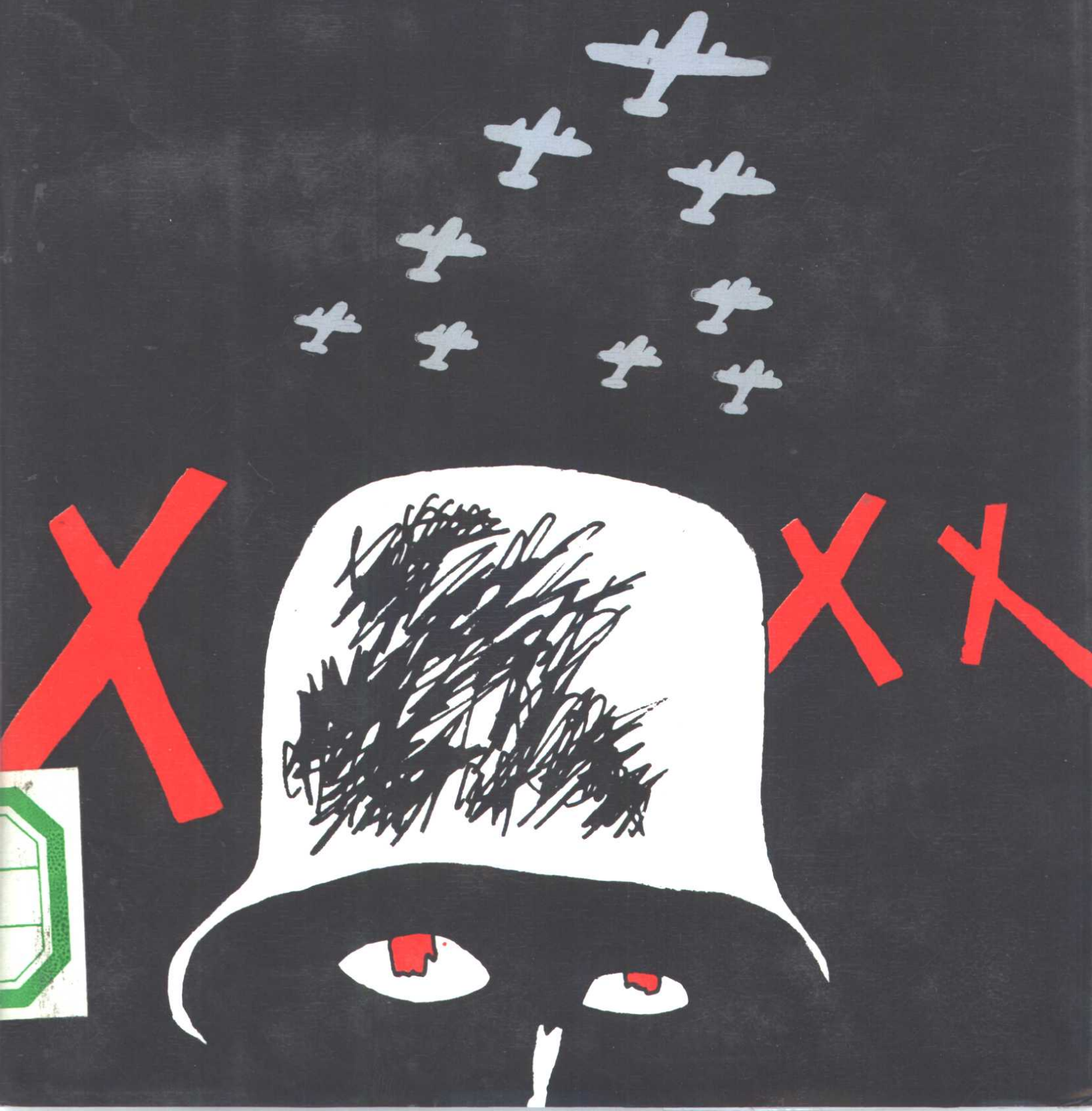


战争和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战争和人

〔日〕五味川纯平 著
苏明顺 黄人毅 张 健 等译校
张 志 邵延丰
钟庆安 何金铠 总校

漫漫流逝的岁月
既会揭开一切鲜为人知的秘密
也会埋葬一切人所共知的事实
.....

【古希腊】索福克勒斯

译 本 序

文洁若

五味川纯平（1916— ）原名栗田茂，出生于一个侨居我国大连的日本商人家庭里，1936年入东京外语大学英文系。在校时因参加“唯物论研究小组”而被捕，在拘留所里关过两个月。1940年毕业后，又来到我国东北，在昭和炼钢厂任职。1943年被征入伍，在穆梭附近构筑阵地时，适逢苏联对日宣战。日军溃败，五味川成为逃兵，在敦化附近被俘，在苏军的俘虏收容所里呆了四十天后潜逃。1948年被遣送回国。他曾这样谈自己早年的经历：“满洲事变开始的时候，我正上初中三年级，开始有了社会意识。战争结束时，我虚岁二十九，性格已经大致形成了。这期间，没有一天不曾发生事件、事变、战争。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与其说是从战争年代中生活过来的，毋宁说是靠战争吃饭的。……尤以我是在满洲生长的。父亲替陆军当承办商，日俄战争后立即赴满洲，直到战败才回到日本本土。我上初中之前，对自己所看到的成年人（父亲周围的那些人）的一言一行，当然不理解。但其中大部分人身上

都散发着战争的气味，都是一些纯粹靠战争吃饭的人。……制造今天的历史的绝大多数人，即使是间接的，归根结蒂也都是协助过那次战争的。我必须从自己的角度重新评价那次的战争，才能向前迈进。”^①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五味川于1956年8月至1958年8月之间撰写了一部以中国东北为背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及其在东北地区的罪恶活动为题材的长达六卷的小说《作人的条件》。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南太平洋连吃败仗的1943年初。日本青年知识分子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搜刮中国人民血汗而经营的一家钢铁厂的职员。他写了一篇有关殖民地劳务管理问题的论文，获得帝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为了和他所爱慕的美千子结婚，并且逃避兵役，他到煤矿里管理劳务。作品通过被抓来在矿里做苦工的中国人、大学助教王享立对梶的批判等情节，写出梶被迫协助侵略战争时的内心矛盾。梶反对矿山里的恶霸工头古屋。当日本宪兵杀害中国矿工时，他挺身而出，制止了宪兵的暴行。于是，他被剥夺了“免服兵役”的特权，押往东北北部边境去了。这时，他又勇敢地反抗军队内部的压迫，从而遭到迫害并坐了牢。日本投降后，他在逃亡的路上，为了自己活命，接连杀害苏军哨兵、中国民兵和老百姓。他终于被苏军所俘，在俘虏营里尝尽了苦役和饥饿的痛苦。在那里，被俘人员照例恢复了原在日本军队的等级制度，流氓分子桐原杀死了一个年轻士兵。梶把桐原揍了一顿，将他丢进厕所，自己就从俘虏营逃跑了。后来他沦为乞丐，在原野上冒着严寒流浪，终于死在大雪纷飞的东北荒野上。

^①见《图书新闻》1965年9月4日。

五味川在《作人的条件》的序言中，说他在这本书里“企图探讨在某种情况下作人的条件”。1958年2月，他向《朝日周刊》编者发表谈话，说他撰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清理一下战争期间自己的亲身体验”。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试图创造一个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是通过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来表现这一主题的。但主人公梶的反抗是建立在强烈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上的。他否定一切权力，除了他自己外，对任何人一概都不信任。因此，尽管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他也做过一些仗义的事情，但到了生命攸关的时刻，他就可以做出像杀害无辜的中国老百姓那样的事。

这部作品被视为日本战后出现的战争文学的代表作。日本评论家白井吉见强调梶是现代英雄，说他“有理智，在极端困危中始终保持着‘人的尊严’”。另一评论家尾崎秀树认为《作人的条件》的主人公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五味川“在梶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也深深打上了作者本人经历的烙印”^①。

1965年至1982年间，五味川纯平的长篇巨著《战争和人》问世。全书共十八卷，长达二百数十万字。（小说以日本大财阀伍代一家的发展史为经，以日本军国主义在昭和年代^②的侵略扩张史为纬，用叙述史实的手法，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一直写到1945年日本投降。与日本统治集团全面扩大侵略战争的历史交错，描写了五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伍代由介是新兴的伍代财阀的家主，伍代公司总经理。他坐镇东

① 《五味川纯平文学入门》，见《作人的条件》（下），第334页，河出书房1973年版。

② 昭和元年为1926年。

京，派他的胞弟乔介窜到我东北，设立了伍代运输公司。乔介雇用一批流氓、走狗，打着经营运输业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干着偷运鸦片的勾当，并进行恐怖活动。他与关东军的强硬派串通一气，搜集政治情报，参与各种阴谋活动，企图凭借武力扩张伍代家族的势力，从而成为“满洲伍代”的实力人物。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沈阳郊外的柳条湖附近炸毁了满铁的火车，并反诬中国军队蓄谋挑衅。于是发生了所谓“满洲事变”，即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战争爆发后，“死亡商人”伍代家大发横财。由介的计划是首先开设炼铁厂，然后一步步地打进关内。他还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大儿子英介也派了去。

伍代财阀家的次子伍代俊介是全书的主人公，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是个关心社会、同情贫苦工人的进步青年。他十三岁时还是个初中学生的时候，就不同意他的叔叔乔介的这个主张：“如果张作霖军队使住在满洲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遭受威胁，就采取让关东军出兵解除张作霖军队武装的强硬手段。”俊介说：“人家不是本国军队吗？……又没有跟日本宣战，凭什么解除人家的武装呢？”乔介训斥他道：“你心肠这么软，必将被赤色分子所利用。”俊介后来还与有革命思想的穷画家灰山浩一来往密切。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占领了东北，还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华北以至大半个中国。1939年，俊介再也无法逃避兵役。他被征入伍，参加了诺门罕战役。他曾死里逃生，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度被抓去充当炮灰。

通过这部作品，作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个人在战争中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像俊介这样一个人，尽管他不要战争，却不得不被卷进去，成为侵略军的一员。

这部作品的构架基本上是按照史实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却是作者自己设计的，气势宏伟，展现了大规模的艺术图景。活跃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中日各阶层的众多人物中，塑造得最成功的是伍代家的兄弟姐妹四人和他们周围的男女青年。五味川纯平写小说的手法是通过情节描写人物，他不大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作人的条件》和《战争和人》故事生动，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在日本颇为畅销，并均拍成了电影。

关于罪恶的侵华战争，由于众多的日本人民也被迫或受骗参加，并遭到灾难，因而在战后，大多数人总想在大梦初醒后寻求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于是，战争文学便应运而生。然而由于作家的世界观的局限，那些蓄意为帝国主义的罪恶进行辩解的作品自不用说，就连五味川纯平这样对侵略战争抱反省态度的作家，其作品也难免存在缺陷。在《战争和人》中，对某些举世皆知的历史事件，却做了片面的描写。关于济南事件，作者竟然说什么日本出兵山东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大肆渲染山东人民屠杀日本侨民的所谓暴行。

作品尽管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南京等地大举屠杀当地和平居民，以及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中国土地上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大量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描写卢沟桥事变后，冀东保安队在通县杀死日本居民的场面。作者还用荒谬的逻辑替日本士兵烧杀、抢掠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的禽兽行为辩护，说这些士兵是用每张一分五厘的明信片征集来的，他们的地位还不如军马；说既然日本士兵受到非人的待遇，他们也不可能把被侵略国的人民当人看待。

然而总的来说，在《战争和人》里，作者还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恶，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中日两国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及日本知识分子的苦闷

和反抗情绪。这部长篇巨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的一幅历史画卷，它以一幕幕战争场面和生活情景，绘声绘色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可以说是战后在日本出现的众多战争文学的集大成的作品。

五味川纯平于1978年因患喉头癌，割除了声带。四年后，替他与外界沟通的爱妻，又患急病去世。但他不曾被重重不幸所压倒，仍以非凡的毅力，笔耕不辍。

今年适值“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通过阅读这部长篇巨著。可以帮助读者重温一下这段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从而进一步加强我们奋发图强的努力。

1991年10月14日

感伤的序

说来有三年了吧。那一天，在伊尔库次克郊外的杂木林中整齐地横排着的长方形坟墓上，积着薄雪。我把雪一掸，露出来的不是死者的姓名，而是号码。那是战败后不久，被拘留在西伯利亚而死去的日本人的坟墓。

我也曾生存于这样的时时刻刻中：要么战死在苏满国境，就那样化为白骨，腐烂于山野；要么仅被赐予一个番号，埋葬在西伯利亚某处的墓地里，仿佛别无他途。眼看就满二十年了。作为一个旅行者去踏访那自己原有可能被葬于斯的墓地，忖度着已永远不能再说话的死者的语声，我真是感慨万千。

谁都不想死，然而还是非死不可。为什么非死不可呢？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个中原因。那个战争年代所包含的意义——特定少数，或许不特定多数的人那种无人性的行为与无所作为的情况，不但被埋葬在那里的人，就连今天还活着的人，也同样地被蒙在鼓里。

我从那一百多天中居然活了下来，这只能说是侥幸或奇迹。又过了十年的岁月，我写了那些只不过是充当消耗品的男

子们的故事。我有必要这么做，按照自己经历的顺序，展开了故事。与对殖民地的人们那种虚伪的人道主义纠缠在一起的赎罪意识，以及从兵营生活一直到战斗的那场恶梦总也排遣不开，我只能那样来写。我巴望着度过这个阶段，及早地度过这个阶段。我并不认为，诉说那个战争年代，仅《作人的条件》那三千张稿纸就足矣。我只不过想摆脱过去，而接近当前这个时刻而已。

然而，西伯利亚坟地上的沉默，像是不容许我就这么自顾自地活下去，因为大伙曾是在炮弹下共过命运的，直到死亡把我们截然分开。

战斗前夕，我那个班里的一名当年入伍的士兵问我：明天就要死了，害不害怕？面对着具有绝对优势的敌军摩托化部队的总攻击，我们只有九九式短步枪。难以想象，任何人会有幸存的可能性。我们不过是为了掩护后方部队撤退而“被舍弃的棋子”而已。我当然怕死。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且觉得还大有可为。当夜就将失却那理应活着度过的漫长的岁月，我是怎样也舍不得的。位于丘陵地带的斜面阵地，在强大的炮火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而我活着，仅仅只是为了在这里挖掘将充作自己的墓穴的“猫耳洞”。承认这一点，在我是难以忍受的。然而悔之晚矣。我只明白，自己正处于害怕也无可奈何的境地。

于是，我摆出老兵的面孔说：“我也害怕。可是，害怕又怎么样？在危险未到来之前，你尽管害怕好了。一旦来临了，就别再害怕了。咱们已别无选择了。”

我们只能使自己听凭炮弹一时的高兴了，并任凭由着个自差别的杀人技术所摆布。当天晚上，我在“猫耳洞”里想着：在这场战争的十几年间，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彼此曾经何等热爱，相互渴求；只有一次的人生就这么白白地断送掉，又使他

们何等苦恼啊。我强烈地留恋人生，留恋那有着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情景。

经过第二天的一场战斗，我所在的连的一百五十八人中，幸存者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

在《作人的条件》中，我也许总算把战争使人尝到的悲哀与愤怒的一个断面写出来了。然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笔几乎不曾触及战争和人之间那形形色色、多层次、错综复杂、拼死拼活、有时却又极其缺乏意义的各种关系。当我结束在苏联的短期旅行，回到日常生活之后，这个问题好像反复在我内心里产生凝结和膨胀作用。说实在的，我曾踌躇不定，生怕一旦上马，不可收拾。我晓得自己是绝对逃脱不了的，却往后拖延着避免与之交锋。

一般说来，我这个人素不信神。也难得去上坟，但就这项工作而言，却奇妙地与坟墓有缘。去年初秋，一个偶然因素把我带到多摩墓地。我是给一个人上坟去的，自从在昭和十五年^①分手后，我们再也没见面了。回国后我本该立即去踏访的，然而不曾这么做。我害怕去那里，害怕去见那个用永恒的沉默迎接我的人。

我从满洲撤退回来后，初次进京的那一天，曾在八重洲口打公用电话，查找那一位婚后的地址。我还记得，当我翻电话本时，手指怎样发颤。我一味地认为，那一位的声音会通过听筒传过来。然而，战争拖得太久了。当时我得到的回音只是：那一位已不在人间那大约发生在我参加军队，辗转于苏满国境的期间。

……当时我是个工读生。谋生与上学，就已把我的精力耗

^①昭和十五年为1940年。

尽了。每一天都充满了痛苦。尽管如此，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机会知道，世上有着一颗温存的心。因此，我对青春的回忆是绕不开那颗心的。从战斗到当败兵，彷徨于生死存亡之间，本非所愿地沦为熟练的杀人凶手，心里却一直这么念叨着：只要活下来，就能重逢，见到想见的那一位。我晓得这是不切实际的。然而我是多么悄悄地巴望，回到尚未被杀戮所玷污的年轻的工读生时代的自己，并突然出现在曾经鼓励过我的那一位面前啊。我想回到不复返的过去。

回忆是要不得的。某个时刻，某个电话，就把过去与现在蓦地割断了。——当我在战场上拾到一百五十八分之四的幸运时，那一位就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时我还一边想着：哎呀，这下子就能跟那一位重逢了，一边像饿狼似的徘徊在山野里。

在那一位的球形墓碑前，我思忖道：我手把手地教过的当年入伍的新兵统统死掉了。我念念不忘地想见到的那一位也已离开人间了。被人血玷污了的我，却幸存下来。这恐怕是惟独动物才有的警戒本能，以及经受得起残酷斗争的神经，在我身上极度地凝聚之故。只有这样的人才得以幸存下来，这跟那些没有神经、缺乏责任心、没有节操的人有什么两样。那么，我们所生活过来的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呀！

我想立即面对这个本来计划往后拖延的主题了。

按说作家只消在作品中谈自己就行了。前言的趣旨可以说是已完全包含在扉页上所印的索福克勒斯的几行诗句里了。我不喜欢在小说以外的场合记载个人感情的经历。我之所以勉为其难，一方面是死者的沉默撕碎了我的心；另一方面，我痛切地感到，不论是那些被赶入永远不能再说话的冥界的人们，还是那些尽管依然健在却不知道内情的人们，就连耍猴儿者手下的猴子都不如。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也好，为了此项工作而做的调查结果也好，都使我对那些以“为了国家”的名义发动了战争的人们，以及凭借冠冕堂皇的言词和强权“指导”这场战争的人们，一概不予信任。然而，对他们的本色，却应该竭尽想象力去了解。批判和责难，做起来都简单。和他们在作品中共同生活，恐怕就不简单了。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有着迥然不同的原则。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的人，则应该处在特定的原则的制约之下。

我和我的合作者，在时间容许范围内，曾竭尽全力勘查并核实了文献与资料。今后数年内也将继续这么做下去。尽管如此，错误可能仍不可避免。我对此并不担心。有的场合我或许也得坚决地做相当大胆的裁夺。就连当事人的记录，也常有差异：要么是故意为之，要么是借口忘却这一方便的理由，歪曲事实真相，或掩饰过去。如把这些写入故事就过于繁杂，然而作为基础构造又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里就以“注释”方式来弥补。

这部长篇的结尾是清楚的。但是在到达之前，很难说需要多少卷数与年月，而且，我这个庞大无比的计划是试图以人这个比重的单位来测定被损坏了的历史的质量，究竟能够完成多少，是无法预测的。

一旦开了头，就只好继续写下去了。当我的《作人的条件》发表后，一位自以为很聪明的人给我下了“愚者的一念”这一评语。蛮好。大概还得承蒙他再这么评一次。

序好像太冗长了。小说嘛，就让它自己去谈吧。故事是从五月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

1964年9月

作者

(文洁若 译)

感伤的跋

我刚好是在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开始执笔的，已经历了长达十八年的岁月。照原来的计划，按说不该拖这么久，然而由于发生了种种事，本书的写作总不见进展。其间，还插进几部推不掉的纪实文学。四年前（昭和五十三年），一向没去过医院的我，不得不动手术摘除喉头。由于割掉了声带，不能说话了。有一种叫作食道发声的办法；把空气送进食道，靠腹部肌肉的压力把它输送出来，借以震动食道粘膜，总算可以用不像是人的声音来说话了，然而需要很大的努力和工夫才能掌握。那时我还有过接近正常人的生活的希望。岂料今年（昭和五十七年）5月，替代我跟外界沟通的妻子，只住了大约一百三十天医院，就突然逝世。为了护理她，有一百多天我没能好好睡觉。她健在时，我浑然不觉，待她一旦撒下我而去，这才深深体会到，多年相依为命的配偶去世，被丢下的那个也就虽生犹死了。

妻子病倒时，第十八卷刚开头。我原计划写完东京审判再搁笔，然而有那么一个本应出庭受审并被判刑的人，却被置诸

2 战争和人

东京审判的圈外，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我开始觉得，对这样事态熟视无睹的法庭，几乎形同虚设；并认识到，倘若写的话，就得彻底地重新做一番调查，并把东京审判为什么只是一场滑稽剧的经过，以及此后的影响，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否则我就不啻是个在历史上胡乱涂抹一通的油漆匠。

我完全不能预料自己还能写几年，也不晓得我的笔力能不能充分表达。尽管如此，一旦我得以再执笔的话，就要试图追究造成日本人不幸的真正原因，探讨日本人为什么凡事都抱敷衍塞责的态度，不了了之，并且还想相信事情已经就这么解决了。

我活得丝毫也不愉快。未必是由于丧了妻，也并非因为可以与之倾吐愤怒的同辈友人太少了，而是因为不论国家抑或大多数同胞，都把掩饰大大小小的诸般恶行奉为信条。惟有坏人才能飞黄腾达，作威作福，而少数老实人、能够区分善与恶而不肯同流合污者，只能靠坏人的残羹剩饭勉强生存下去。像这样可怜、可鄙的状态，遍布我们这整个岛国。

据说古代圣贤有云：笔锋刚劲胜过剑。果真如此吗？依我看来，笔杆子正热衷于为邪剑服务哩。

1982年10月

(文洁若 译)

译者的话

《战争和人》是日本当代文学名著，在日本影响很大。全书分为四部，共十八分册，二百余万字。中译本合成四部出版：第一部《命运的序曲》；第二部《群魔狂舞》；第三部《盗火猎人》；第四部《地狱之门》。

该书第一部于1965年出版，它一问世，立即在日本引起轰动，成为畅销书，相继印刷达三十次。接着，后三部也陆续出版。后又由日本名导演山本萨夫搬上银幕。

这部小说篇幅之所以长，是因为它以日本法西斯从1928年制造“济南惨案”起，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罪恶侵略史为背景，再现了日本以“满洲为生命线”一步步走向侵略战争直至灭亡的历史。书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如“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芦沟桥事变”、“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南京大屠杀”、“平型关之战”、“百团大战”、“英帕尔作战”、“中途岛之战”等等。书中还描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如日本侵略者镇压我台湾高山族人民雾社起义的罪行，并从这里得到必须利用傀儡